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中满族形象的域外书写

苑阁婷

(延边大学,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延吉市, 邮编 136200)

摘要: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 自古以来,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使节在明清朝天、燕行过程中留下了珍贵的使行文学史料, 用文人视角细致刻画描写了一幅幅中国旧像。18 世纪上半叶是中朝关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朝鲜使行文学中对中国满族的印象也呈现矛盾的特殊性。本文旨在通过域外汉籍对于满族形象的域外书写, 以 18 世纪上半叶为研究范围, 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主要文本依据, 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研究视角, 分析朝鲜使节眼中满族形象的双面性, 探讨异国形象在社会集体想象下作为“他者”所被诠释的原因, 进而得出以史为鉴, 民族交流与认知、民族文化心理方面辩证扬弃的启示。

关键词: 《老稼斋燕行日记》; 满族形象; 域外书写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与学术价值

1.1.1 研究目的

考察朝鲜使行文学中满族形象的域外书写一方面直接目的在于有利于借助域外汉籍完善满族文化研究, 发掘精神遗产, 另一方面, 察古的目的无外乎在于鉴今。考察朝鲜来华使节眼中的满族形象, 对于窥探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状况, 探析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重要作用, 利于以此为借鉴, 找到处理民族之间关系的最佳手段, 也有助于丰富民族对其自身的理解, “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身份下的互动认知, 彰显了民族的深刻文化意蕴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一个民族只有认清自己, 才会重塑、进步、走向繁荣。摆脱“我族中心主义”, 坚持文化相对论和价值多元论, 才会走向未来。

本文旨在研究朝鲜十八世纪上半叶对满族的形象认知, 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主要研究依据, 梳理阐释满族形象的域外书写。继而揭示不同民族间“想象的互相诠释”, 探析异国形象下的社会集体想象机制。

1.1.2 学术价值

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形象问题是学术界探讨活跃的话题。朝鲜族与满族从史前时代以来, 就共存于东亚一隅,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对方的行为方式, 对话活动, 实践行为不断进行印象累积, 形成社会集体想象。朝鲜在来华使行的过程中留下了珍贵的域外汉籍, 这是研究两族关系及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些文本描绘的满族记忆, 一方面是悠久而根深蒂固的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特定现实文化语境中又不断为满族形象注入新的话语资源, 成为新的满族记忆汇入社会集体想象物中。由于不同民族间文化心理差异巨大, 文本中的异国或异族形象难免失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 可以提供解释方法, 即乌托邦式的创造性虚构和意识形态式的真实性再现。而这一研究视角下的满族域外形象及原因的研究尚且较少。本文不仅对于揭示不同民族间“想象的相互诠释”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于朝鲜族与满族的自我与他者、想象与再现的深层阐释具有一定的贡献作用。对于丰富域外形象研究, 满学发展, 域外汉籍的挖掘, 形象学、文化学、民俗学的文学认知也有一定帮助。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于满鲜关系和满族形象的研究成就颇丰，且不断趋于多元化，学者们用多学科视角，包括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针对于满族形象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满鲜关系中满族形象的关照。这一角度的研究大多是从历史学角度开展的，代表性的论文有：《满清入关前与李氏朝鲜的关系》（晁中辰，1995），《论清兵入关后大清与朝鲜的关系——兼与韩国全海宗教授商榷》（魏志江，2002），《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与朝鲜的关系》（刁书仁，2001），《建州女真与朝鲜交涉之研究——以〈建州探情记轴〉为中心》（刘秉虎，2003）；《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朝鲜与女真关系述略》（朝鲜，李淳信，1967）；《朝鲜前期对女真关系和女真社会的形态》（韩国，金九镇，1984），《清和朝鲜》（韩国，崔韶子，1995）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学研究范畴，或进行个案研究，或进行关系梳理，或进行资料性描述，始终没有真正做形象学阐释。

第二，关于燕行录、北学派与满族形象的关联。国内有以下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论文：《〈热河日记〉与满族民俗》（吴绍钊，《延边大学学报》1984.2），《〈热河日记〉与中国文化》（吴绍钊、金柄珉，载《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燕行录〉初探》（王政尧，《清史研究》1997.3），《读朴趾源〈热河日记〉》（郑克晟，载《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情感与书写：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黄彪）[黄彪.情感与书写：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在中，对《老稼斋燕行日记》中朝鲜朝使臣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女性生活习俗，尤其是满族女性的人物形象与生活习惯进行了研究。金明实在《朝鲜使节通过发式建构的满人形象及成因——以〈燕行录〉为中心》[金明实.朝鲜使节通过发式建构的满人形象及成因——以《燕行录》为中心[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及《朝鲜使节通过服饰建构的汉族男子形象研究——以18世纪上半叶〈燕行录〉为中心》两篇文章中，通过《老稼斋燕行日记》作品的记载，对于金昌业以“他者”角度所刻画的通过发式所建构的满族人物形象、通过服饰建构的汉族男子形象进行了系统的人物形象研究，对朝鲜朝使节丑化满人形象之成因进行了阐释。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围绕燕行录中具有代表性的《热河日记》以及北学派而进行，且大多重点关注中朝文学传播与满族社会生活、民族风貌，对于域外书写原因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反清复明的辨析上，从微观的形象学考察，进行独立的形象学理论探究仍然不足。

第三，朝鲜人视域下满族形象的文学性探究。徐东日教授在《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10.]中，对《燕行录》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主要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对朝鲜文人笔下清代满族人物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归纳，将国内与域外的不同人物形象记载进行了对比。书中特别以《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例，对《老稼斋燕行日记》中满族人物形象及文化，进行了深入有层次的分析，对《老稼斋燕行日记》人物形象学研究意义重大。全美子《18世纪韩国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三种‘燕行录’为中心》”，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切入，对在韩国游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部作品（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之燕行录）进行分析，描述了18世纪韩国文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刘广铭在《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刘广铭.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中，对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物典型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尤其对于清前期满族皇帝的不同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比对与分析，对《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洲族形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与解读，在历时性方面梳理出了满族形象的轨迹变化。这一领域中对朝鲜人视域下的满族形象的原因分析缺少更深层的民族心理挖掘，缺少历时轨迹上对于特定时期的满族他者形象阐释。

1.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阐释为方法论，即考察异国形象在民族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及其复杂表现。运用后殖民批评，即他者概念下对殖民文学的文本解构，来揭示民族话语实质。运用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史料分析中阐释历史与文学的交互关系。

1.3 中朝交流与使行体验

1.3.1 18 世纪上半叶朝鲜朝与清朝关系状况

18 世纪上半叶，朝鲜朝经历了肃宗（1674-1720）、景宗（1720-1724）、英宗（1724-1776）三代统治。

显宗十五年（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云南王吴三桂乱起，朝鲜士大夫向显宗建议收复中原，“因时乘势，审其机而急图之”[吴晗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P3991。]。但不久显宗升遐，十三岁的世子李惇即位，即为肃宗。朝鲜士大夫们依旧上疏北伐，但肃宗审时度势，稳健行事，并没有对清采取激进行动。肃宗则表示说：“予岂无雪耻愤惋之心哉！为其势之不敌，尤为恨叹”。[吴晗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P4018。]肃宗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没有忘却父祖“反清尊明”的遗愿，并时刻提醒朝臣们亦不要忘记。肃宗在宫廷旁军队门外大报坛，大报即效天报德之意，在此设祭悼念大明皇帝，悼念后还做御制诗。尽管肃宗大力鼓吹反清复明，但毕竟时过境迁，世事久而久之易晦，朝鲜百姓对于复明的执念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加之清朝统治渐渐稳固，对朝鲜也进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英宗以后，对清朝皇帝的态度也从不满变为平和相待。虽然对清态度有所好转，但反清复明之潮从未退却，英宗追思大明的活动也未曾停止过，只是程度变轻罢了。对于清朝的安抚与优待，朝鲜更多的是忍痛喊冤的接受，虚与委蛇的认同，因此出现矛盾心理也不足为奇。

1.3.2 金昌业与《老稼斋燕行日记》

古代朝鲜曾多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使节中部分文人将游行的过程以及见闻进行了细致地描摹并形成诸多优秀域外汉籍文本，在明代被称为《朝天录》，在清代少数民族满族掌权，被称为《燕行录》。《老稼斋燕行日记》是燕行录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老稼斋燕行日记》创作于清代康熙五十一年，即公元 1712 年。作者金昌业（1658-1721），字大有，号老稼斋，因此其作品以其号而命名，被称为《老稼斋燕行日记》。金昌业家世显赫，出生于朝鲜名门望族，文学功底深厚。1712 年，时年 54 岁的朝鲜文人金昌业与其长兄金昌集，以冬至使兼任谢恩正使的身份，从朝鲜国都汉城出发，来到清朝国都北京。在北京逗留凡 46 天，其间考察清朝各种制度，品鉴方物，并与清朝文士多有交往，于翌年 3 月 30 日回到汉阳的艰辛旅程。老稼斋随使团“往返五朔，共一百四十六日，去来路程，共六千二十八里，在燕京出入及在道迁行者，又六百七十五里，得诗四百二篇”。对于我们从朝鲜使臣的域外视角，了解与研究清代前期的政治状况、社会变迁、民俗文化与风土人情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于研究与补充域外视角下的中国满族形象与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考。

第二章《老稼斋燕行日记》满族形象的域外书写

2.1 外貌性格特征

帝王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最直接的代表，在进行异国形象研究时，帝王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康熙八年（1669 年），闵鼎重做为朝鲜正使率使团出使清朝。闵鼎重在其《老稼斋燕行日记》中将他所见的康熙帝做了如下描述：“清主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其出入辄于黄屋中回望我国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以察为明，惩辅政诸臣专权植党之患。”而老稼斋描绘的康熙形象则是：“皇帝向西盘膝而坐，

广额，顾稍杀，髻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其衣帽皆黑，与凡胡无异……见其身长可七、八尺”。[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P98。]1669年距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率清军第二次入侵朝鲜，并追使之签订城下之盟去之不远，在闵鼎重的记忆中，这段惨痛的民族历史可谓记忆犹新。因此，闵鼎重笔下的康熙基本上是一个刻薄、暴戾的形象。实际上康熙长得并不至于象闵鼎重所描述的那样难看。康熙时期，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健全，国家统一的推进，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引向繁荣。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已经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崔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清圣祖实录》卷300，跋）。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另外，清朝统治者有意对朝鲜采取了“抚藩字小”方针，在许多方面给予朝鲜格外的体恤照顾，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朝鲜人“反清复明”的意识已不及从前鲜明，老稼斋对康熙形象的描述正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在一般朝鲜士人身上的反映。

在金昌业的《燕行录》作品中，有不少描述满族人怪异外貌的文字：兀喇总管睦克登……人小而眼有英气，语时如笑，甚慧黠，亦非雄伟大人。[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I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120页。]五阁老在后殿月廊，余随裨将辈往见，清阁老二人同坐于北边一炕，汉阁老三人设椅炕下一带坐焉，各前置桌子，叠积文书。清阁老一松柱，一温达。温达短小，容貌古怪而有猛意，面赤黑须，髻少，一目眇；汉阁老一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容貌端整，眉目清明，须髯白；一萧永祚，奉天海州人，身短面长，前一齿豁；一王琰，江南太仓人，有文雅气而容貌丰盈，精彩动人。温达、松柱相与语，汉阁老三人皆阅视文书，或俯而书字。……尚书清瘦而身小，眼有精神，举止轻率。侍郎在右者汉人，容仪魁伟，沉静有威，不轻瞻视。左者容貌平常，清人云。……此处天下人皆会，而形容各异，使汉人、清人、蒙古、海浪贼、喇嘛僧及我国虽同服色绝不相混，而惟清汉或不能分矣。[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I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119页。]以上引文在描述满族人的形象时，基本上比照汉族人而加以描述的。即在描述“李光地”、“王琰”、“萧永祚”等汉族官员时，使用了“容貌端整，眉目清明”、“有文雅气而容貌丰盈，精彩动人”、“容仪魁伟，沉静有威，不轻瞻视”等肯定性的语汇；而在描述“睦克登”、“松柱”、“温达”等满族人时，更多的是使用了“甚慧黠，亦非雄伟大人”、“容貌古怪而有猛意”、“举止轻率”、“容貌平常”等否定性的语汇。在以上褒贬色彩十分鲜明的语汇对比中，金昌业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情感立场。比金昌业晚八年赴燕的朝鲜朝使臣李宜显，在自己所撰写的《庚子燕行杂识》中，更加集中而突出地描述了满族人的形象：“清人大抵丰伟长大而间有面目极可憎者。膻臭每多袭人，言辞举止全无温逊底气象。……路中见男胡率是疏髻，虽累十百人须髯多少一皆均适，绝无胡髯披颊者。岂头发既尽剃，故髯亦剪繁略存，只以表丈夫。”[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在作者笔下，“男胡率是疏髻”，他们“须髯多少一皆均适，绝无胡髯披颊者”，而且头发“尽剃”、“髯亦剪繁略存”，从而“只以表丈夫”。这是满族人区别于汉族人的一个典型的体表特征，可以说，这种怪异性是他者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可能是被描述为“面目极可憎”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长期生活在农耕文化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多方面地接受了中国儒学“华夷”观的影响，认为人们只有束发戴冠才是文明的，才具有“礼仪”。所以，也习惯于用发式来划分“华夷”，将“披发”视为夷狄的表征，视为一种落后、不文明的文化现象，从而大加贬斥满族人剃头辮发的习俗，而且通过他者化，极力夸大满族人的“怪异性”或“异类性”，使之最终被刻画成“丑类”的形象。实际上，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俗，应该尊重各民族的习俗，发式并不分贵贱，也不代表文明与不文明。剃发原本是女真人的一种风俗习惯，即“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只留顶后中间长发，编成辮子，垂于肩背，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不剃外，四周头发不得蓄长，要时时剃除，所以叫做剃发或剃头。”[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燕行录选集》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版，第32页。]辮发垂辮这种发式源于满族的原始宗教——

一萨满教的宗教意识。萨满教认为，发辫生于人体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是人的灵魂所在，所以发辫为其族人所重视。古代时，满族在战场上捐躯的将士，其骨殖如无条件带回故里，其发辫则必须带回，俗称“捎小辫”，这是满族天穹观的一种反映。尤其是他们头发“尽剃”，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满族长期以来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的吃穿用都出自山林。满族男子一年四季常结伙进山，进到森林深处，十几日或几十日采集狩猎。在深山生活的自然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至于头发梳成什么式样，自然要放在其次，并且要服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即山势陡峭、林木遮天，在这里与野兽搏斗并采集山货，就需要剃头辫发，以减少树枝的刮扯；同时，前部不留发，还可以避免在跃马疾驰时让头发遮住眼睛。他们脑后留一条大辫子，在野外行军或狩猎时，又可以枕辫而眠。所以，负责外出狩猎或耕种的男子大多不披发，而在家从事家务和织布的妇女大多披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于是，满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就形成了其剃头辫发的习俗。其发式可以用“金钱鼠尾”这四个字来概括，这种发型是将四周的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如一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随着满族的兴起和努尔哈赤的向外扩张，满族薙发垂辫的风俗就逐渐转化成了汉满两个民族间的政治斗争问题。实际上，满族也是过分看重了“薙发”的作用，认为只要汉人“薙发”就能顺从满族的统治，而实际上反而更加深了两个民族间的内在矛盾。

总体来说，《老稼斋燕行日记》中体现出的是为人淳朴、崇文尚武的满族性格特征。在《老稼斋燕行日记》第一卷的“山川风俗总目”中，作者金昌业就对所见所闻的满族人物的形象，进行了肯定的积极认同：“清人貌丰伟，为人少文。少文故淳实者多，汉人反是。南方人尤轻薄狡诈，然或不尽然。清人亦入中国久，皇帝又崇文，故其俗寝衰矣。”指出了满人的为人纯朴，相反地指出了汉人的轻薄和阴险狡诈。描绘了纯朴的满人物形象和狡诈的汉人物形象，可以说对满族人物给予了高度肯定的积极描写，相反地却对汉人形象提出了否定质疑。此外，引文还从侧面反映出了满汉语言的相互交流与融合，衬托出了满族入主中原后，满汉文化的相互借鉴与不断交融，体现了满族统治阶级在面对满汉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的情形下，对中原传统汉文化的接受及推崇。

关于满族人擅长骑射的形象，在《老稼斋燕行日记》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分别有如下的表述：“路遇一屋车，大胡坐其中，衣帽鲜华，似有官者，从胡十余人，皆佩弓箭，散行草间搜兽也。使译辈问之，来自广宁云，从胡所骑者色马绝大善步，昌晔使人问价，言一百两。”[[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M] P399] “路中见三橐驼过去，又有一胡骑马持红缎金字绣旗一面过去。其后六七骑随来，其中一人状貌颇伟，云是大官，其后又有旗如前，四五骑又随过去。”[[韩]林基中. 燕行录全集[M] P433] 这两段引文中，作者都写出了满族人物衣着得体、高大威猛、状貌颇伟的积极形象。在引文中，作者对于满族人物的穿着得体，进行了积极肯定，同时作者还描绘了满族人佩弓戴箭，外出游猎的活动场景，对满族人擅长骑马打猎的民族特色进行了记录。反映出了满族人的高大威猛，同时也将满族，作为传统游牧民族的民族特色与风俗表现得淋漓尽致。

2.2 衣食住行

服饰方面，如《农隐入沈记》载：“男子上服曰褂子，其长等身，中割前衿，如我国军服而不割傍，其长至腰者曰马褂子，亦开前衿，而俱用纽扣。其内曰袍子，状如我国周衣而无衩，傍小割如战服，后长割至尻前作交衿，而右斂斂至胁向内方割，又斜至于底，自领下交衿处作纽，至方割处而止后边中割者，则褂子亦然。故跨马之时，不烦斂后矣。其内曰大衫子，制如我国之衫而长及腰，其内曰小衫子，即贴肉裹衣，而与大衫子同。”又如《梦游燕行录》载：“汉女皆束发而髻，四面四绕；满女则直撮髻于顶。汉女缠足，着尖头短靴，行步摇摇如不自立；满女不缠足而着高靴。”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其服饰很有特色，入主中原后，满清统治者力图保持满族的服饰文化，因此在燕行文献有诸多关于满族服饰的描写和介

绍，其民族特色非常鲜明，是我们研究满族服饰文化的重要材料。

满族民居也很有特色，如《入沈记》：“屋制三面多合壁，不如我国之多出窗眼，一面作中门而必用板门，如板门始为炕，或作左右炕，或作一字炕，或作口字炕，此则随便。炕首灶口之间隔以板障，而如非店舍则皆作壁，又设一板门而至于灶口，则勿论华陋，皆在中门之内、一屋之中矣。”目前此类满族的特色民居已不多见。

饮食方面，朝鲜燕行使出使中国，沿途多有驿站提供饮食供应，因此燕行使对当地的饮食文化也有诸多记述。其饮食文化，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特色。如《入沈记》：“饼则通称饽饽，而不见甑上蒸炊，皆是油煮，故经久不败。有鸡鸣糕，如我国白雪糕而色黄味甘，熏可食，似入鸡子于作糕时，而不可晓也。”描述了满族人喜欢油炸食品的饮食特点。上文提及的“鸡骗糕”，至今仍是东北地区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又如：“华人之嗜烟倍于东俗，烟袋几乎不离于口，下至幼稚，莫不皆然。”这也是东北三大怪之一，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吸食旱烟，烟袋是吸食旱烟的专用工具，一般由烟袋锅烟袋竿烟袋嘴构成。《儿女英雄传》第二八回，“太太把烟袋递给那丫鬟、”现在东北一些偏远农村地区，老年人尚保留这种饮食习惯，但也并不是很普遍了。

2.3 民族信仰

民俗方面，清代朝鲜燕行使出使中国大多走陆路，途径东北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满族人口较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燕行使对异族文化兴趣浓厚，故大多记载下来保存在文献中，成为我们了解清代满族民居的重要参考。如《燕山录》：“初生孩儿，使卧笼器内，悬于梁上，令人推却，以习骑马云，见之可怪。”这是满族人传统的育儿工具——悠车，又称“摇车”，形状如船，一般用筛板圈成，用长皮条或绳将其悬于梁上。后来被称之为“东北三大怪”之一：“大姑娘叼烟袋，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满族的育儿风俗，朝鲜燕行使觉得很奇怪，也很新奇，故将其记录下来。

2.4 民族语言

语言方面，如《老稼斋燕行日记》：“清人皆能汉语，而汉人不能为清语，非不能也，不乐为也。然不能通清语，于仕路有妨。盖关及衙门皆用清语奏御，文书皆以清书翻译故也。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以此清人后生少儿多不能通清语，皇帝患之。选年幼聪慧者送宁古塔学清语云。”又如《癸卯燕行录》：“凡有所奏于皇帝者，必用清语，皇帝亦必以清语为常用之言，故赞唱亦以清语唱之，盖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之礼者也。汉语者，即中国之正音也，大小言语，必以文字为之，绝无释意之言，而又无悬吐之事。其余外国则方方各异，言言相殊，而莫非方言也。方言有万不同，而蒙古语、清语、朝鲜语尤难学习云。”燕行使出使中国，语言沟通非常重要，因此对当时语言使用的记述非常全面，既突显了清代“国语”——满语的绝对权威，同时也描述了当时汉语使用的普遍性。由于“小中华”意识的影响，燕行使多用贬斥色彩的词语来描述满族人，如“胡人、胡虏、胡皇、虏、虏酋、蛮夷”等等，对清代的官方语言——满语，燕行使臣也蔑称为“胡语”，如孙万雄《燕行日录》载：“使臣以下员役具冠带，诣鸿胪寺行朝参习仪，由西夹门而入，北向立于庭，鸿胪二人分东西相向立，以胡语传声，遂三跪九叩头而出。”对满语的形容带有轻蔑、厌恶的态度，如赵最寿《壬子燕行日记》载：“及一小溪边，清人四五结幕屯聚于雾树中，言语侏离不可辨。使马头辈通言，乃出猎者也。”

第三章 双面性的异国形象成因

朝鲜人眼中的满族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张力形象。这种双面性的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和个人体验与“前理解”所造成的。

3.1 社会集体想象

法国学者巴柔曾指出：“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是双极性（认同性/相异性）的阐释”。[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24。]“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按主体社会的意愿来构造的。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则将这种社会总体想象大致分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形态，以对应巴柔的双极性。

3.1.1 意识形态式的真实性再现

“意识形态”在这儿并不具有政治学上的意义，而只是社会群体需要的代名词。“它具有整合功能”，即对一个特定群体能起到整合作用。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群体按本社会模式对一个与自己有相异性的特定群体进行整合，使整合后的形象与自己认同，这就是社会总体想象物的“认同性”。它“是被理想化了的诠释，通过它，群体再现了自我存在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32。]一般来讲，意识形态化的异国形象中，文本作者以维护本国的权威地位和保存现实为出发点，用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范型去表现异国，用社会固有的观念去解读他者，对相异性进行整合。这样往往表现为对异域文明持否定态度。

3.1.2 乌托邦式的创造性虚构

“乌托邦”一词在这里也与其传统内涵不相一致。由于一个社会群体对现实的质疑而向往一个与自己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这样，一种离心的异国形象的描写就具有了群体象征性特征。这类形象偏向于相异性，它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背离，从而具有了“社会颠覆的功能”。德国学者曼海姆指出，乌托邦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构成了对现实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威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246。]在文本中，乌托邦表现为对异国文明的肯定，在承认其相异性的基础上，对本土的现实加以质疑。

“社会总体想象物所表现出的两极性并非是绝对对立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者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包容的，虽然相对本土社会模式而言，意识形态是向心的，而乌托邦是离心的，但乌托邦的最终价值还是要归并到本土群体文化中来，而意识形态在一种强化本体身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相异性的渴望。因此，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不是截然分离的，往往是相互渗透，形成一种辩证包含的关系”。[叶绪民等：《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P157。]若以形象学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概念来描述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人形象，则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前的满族人形象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满族人形象则带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朝鲜人对满族人的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华尊夷卑”观念在认识上的变化。

3.2 个人体验与“前理解”

在朝鲜使节个人层面，使行文学文本创造者的耳闻目见的记录 and 传统印象与个人想象的融合碰撞、文本创造者独特的创作手法，都有可能异化或夸大异国形象。

第四章 结论

归纳而言，一个民族只有认清自己，才会重塑、进步、走向繁荣。摆脱“我族中心主义”，坚持文化相对论和价值多元论，才会走向未来。分析朝鲜使节眼中的满族形象，不仅对满族自我认识有帮助，也可以从中反观朝鲜族自身文化心理，这是民族进步必须经历的过程。民族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再现，和特定时期历史条件下承认异国文明的相异性，也就是乌托邦式的创造性虚构，这两者是相互渗透互相辩证影响的过程。如果一个民族可以做到放下成见，以理性的眼光向外族学习，那么这个民族在进行创造性想象，对异国形象肯定欣赏

的同时,也会影响此后的意识形态社会集体想象,使其趋于理性,不断革新。这不仅对于民族进步,而且对于民族国家间的交流对话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彪.情感与书写: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2] 金明实.朝鲜使节通过发式建构的满人形象及成因——以《燕行录》为中心[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 [3]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4] 刘广铭.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 [5] 吴晗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P3991。
- [6] 吴晗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P4018。
- [7]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P98。
- [8]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I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 1989 年版,120 页。
- [9]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选集》I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 1989 年版,119 页。
- [10] 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0 页。
- [11]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燕行录选集》V,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 1989 年版,第 32 页。
- [13][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M] P399
- [12] [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M]P433
- [13]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24。
- [14]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32。
- [15] 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246。
- [16] 叶绪民等:《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P157。

The Extraterritorial Writing of Manchu Images in Jin Changye's "Diary of Yan Xing in Laojiazhai"

Yuan Geting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 Jilin, Postal Code136200)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a and the DPRK have been inextricably linked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Korean envoys left precious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Yan travels, and carefully portrayed and described old Chinese portra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i.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was a crucial period in Sino-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impression of the Manchus in Korean diplomatic literature also showed contradictory particular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uality of the Manchu image in the eyes of Korean envoys through the extraterritorial writing of Manchu images by non-territorial Han Chinese, tak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research scope, taking Kim Changye's "Diary of Lao Jia Zhai Yanxing" as the main text basis, and taking comparative literary iconograph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two-sided nature of the Manchu image in the eyes of Korean envoys,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foreign images are interpreted as "others" under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society, and then draw enlightenment from history, ethnic exchanges and cognition, and dialectical abandonment in term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sychology.

Keywords: Diary of Yan Xing in Laojiazhai; Manchu image; Extraterritorial writing

作者简介: 苑阁婷, 延边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